

樱花译语 | 中国农村母亲在子女教育期望上是否做到了性别平等？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03-08

原标题 | Do Mothers in Rural China Practice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作者| Yüping Zhang, Grace Kao, Emily C. Hannum

翻译| 糕糕

审核 | 吴航

注：非常感谢糕糕同学，帮助我们翻译了这一篇极其专业而大篇幅的文章。在性平等的工作上，比起低质量而破碎的争论，我们尤其需要现实而细致的研究。新的学期到来，愿意参与翻译工作的同学可以致信我的邮箱willer1997@163.com。



二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大大提高了中国妇女的生活质量。尽管现有进步已相当显著，但在部分地区，文化观念、性别和传统家庭结构相关的各种社会规范仍在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进一步激化“重男轻女”的观念（Croll 2000; Li and Lavelly 2003）。这种偏爱的现象，在异常之高的男女出生比中暴露得最为直观，我们通称其为“消失的女孩”。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后变得愈发极端。

然而，父母是否在教育投入方面更偏向儿子？这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近年来，男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不断缩小，微乎其微。在时代大趋势下，传统观念是否仍是女性受教育路上的一大绊脚石？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重点关注中国西北部一贫困农村地区，调查母亲的性别观念和她们对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采用《甘肃省儿童家庭调查报告》（Gansu Survey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GSCF, 官方中译不详）中涵盖甘肃省9-12岁农村儿童、家庭、学校等情况的纵向数据，在对照家庭情况下，探究母亲们在性别平等、养老保障、子女回报、以及对子女继续深造等方面的态度。同时，还需考察孩子在校表现与母亲的教育期望是否相关。

01 研究架构

一. 对教育期望的考察

与教育期望相关的许多早期研究都基于“地位获得”的思路框架。该架构认为，家庭作为一种重要社会机制的存在，起到了社会分层的作用。父母起示范作用，为孩子提供经济、社会、文化、知识资源；继而，孩子期望在成年后获得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的教育期望，在亲子代社会地位的传承中起关键作用。然而，尽管这类架构的提倡者强调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代的激励作用，反

对者提出，教育“期望”只是对未来生活利益开销的一种理性评估。不同阶级的人们对从教育中获益的几率有着不同的判断，因此对教育的期望实际上是基于“成本与机遇”的评估框架。此类“将期望化为理性计算”的观点，更加贴合高中学生的需要（由于他们正面对深造或就业的选泽）。而对于较小的学生，父母的期望代表着向未来更高学历迈进的动力。

而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中，父母教育期望以截然不同的概念呈现，其中大多都基于经济策略的架构。送孩子上学的决定常常代表着家庭的一种“策略”：使回报最大化。但这种策略往往忽视了孩子的成绩对父母“投资”成果的影响。

.....（本节余下内容总结已有研究架构，暂未翻译）

二、发展中国家性别与教育的研究

大量文献已考察了女孩在教育资源获取上的劣势处境，并分析了家庭因素对该男女差异的影响。其中多数研究都采用了上文所述“家庭投资策略”的架构。尽管许多国家中，女孩在教育资源获取中的劣势正逐渐减小，但在一些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家庭给予孩子教育的意愿仍受性别因素主导。

由于贫困，为得到孩子未来的回馈，家庭需谨慎进行教育投资；同时，在这些回馈上，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和家族体系偏好男性，因此这两种现象严重催生了家庭对男孩投资教育的倾向（Stromquist 1989）。例如亚洲许多贫困地区的传统中，女孩会嫁出家庭，甚至嫁出村子，因此家庭基于生存需要，必须在男孩而非女孩身上投资教育。

关于发展中国家教育中两性不平等问题，第二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聚焦于家庭中理性成本效益分析所展现的文化背景，并重点关注该文化语境下，与妇女所处地位与角色相对应的文化规范和态度。在传统农村的普遍认知中，女孩被定义为未来的母亲和妻子，因此这类与性别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相联系的文化规范可能会阻碍家庭对女孩教育的投资。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念框定了家庭对自身状况的认知，并导致他们做出“理性”决策。传统的家庭结构便是这些性别规范的体制基础。

一方面，那些认同传统性别规范的家长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教育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对男女孩子的未来回报，另一方面，这些家长要求女孩承担的家务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学习成绩，所以很难将基于家庭理性投资的分析角度（前文第一种）与强调文化背景的角度（前文第二种）割裂开来。不过，我们可以明显辨别出这是由于顾及家庭经济而产生的不平等，还是外界和传统观念联合作用下产生的不平等。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贫穷和传统性别价值观相结合的情况对于女童教育投资最为不利（Stromquist 1989; Filmer 1999）。

三、中国语境

从儒家思想的历史基础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将女性置于比男性更低的地位（Li and Lavelly 2003）。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1966-76），中国政府通过为妇女平等提供去律保障，鼓励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大力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指导两性关系的官方话语强调男女平等，如著名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Lin 1993; Li and Lavelly 2003）。

相关研究表明，在文革期间，女孩在基础教育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而在市场转型的最初几年，这种进步有所放慢，随后又恢复了（Hannum and Xie 1994; Zhou et al. 1998）。中国如今在小学入学率上已实现基本普及，中学阶段的性别差距也很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统计，截至2000年，全国中等教育毛入学率男生占66%，女生占64%。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地区，教育程度上的性别差异已经相当小了。在对中国某大城市的研究中（译者注：此处应指1998-99年在武汉市进行的问卷调

查)，Ming Tsui和Lynne Rich（2002）发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没有性别差异。

然而，许多农村地区特有的父系家庭结构强化了父母依靠儿子养老的这种传统规范。该情况下，父母可能将他们对儿子教育上的投资视为长期保险(Hannum 2003; Li and Lavelly 2003)。许多学者认为，贫穷、养儿防老的传统、以及教育成本上涨三者相结合，迫使父母让儿子接受比女儿更高的教育。对女孩而言，当成本上升和资源受限时，她们辍学的风险可能增加(Hannum 2003,2005; Li and Lavelly 2003)。

然而，在中国的教育分层相关文献中，有关父母的性别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影响子女教育的实证研究很少。中国西北农村（注：应指甘肃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的大多数母亲实际上对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表达了平等的态度，同时，研究表明女孩在学习成绩和参与度方面都优于男孩(Hannum and Kong 2002)。这项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大多数母亲所持的平等观念，与阻碍女孩们接受教育的深厚传统观念共生共存的复杂图景。

在中国农村，除了性别规范和家庭因素，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是决定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入学考试分数较低的情况下，继续上学所需的费用会更高。以往研究表明，女孩必须表现出更强烈的意愿才能继续上学：学习成绩差的女孩更可能在小学辍学，而大多数男孩会继续升入初中(Brown and Park 2002; Zheng et al. 2002)。然而，在中国农村地区，目前没有研究关注家长如何根据孩子的成绩来规划教育前途。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中，关注母亲尤其合适，因为大多数家庭主要由母亲照料儿童。在甘肃农村情况尤其如此，许多父亲是全职或兼职的农民工，至少会离开妻儿生活的村庄一段时间(Brown 2003)；而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家庭，并在土地上劳作。母亲在儿童接受社会化，分化为不同性别角色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母亲不仅只作为家庭代表规划孩子的教育，她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可能会影响孩子在校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可能会影响家庭的育儿方式。在这些情况下，母亲日常所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建立的纪律规范，将对孩子的学校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

02 假说建立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究了母亲对性别的态度、对孩子未来回馈的期望、以及对样本子女学习前途的预估是否影响到她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我们推测，母亲的性别态度可能与儿女的教育愿望密切相关：

假设1. 支持性别平等的母亲与不支持的母亲相比，前者对样本子女的教育期望具有更小的性别差异。

虽然总体上母亲们表达了平等的性别态度，但她们仍须面对目前经济资源有限的现实，并顾及未来养老的问题。鼓励重男轻女的经济激励措施可能会影响母亲的教育决策，尤其对于经济资源匮乏的家庭而言。这种情况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假设。

假设2. 认为应养儿防老的母亲与不持此观点的母亲相比，前者对样本子女的教育期望具有更大的性别差异。

除了母亲的性别态度和养老态度，母亲未来预期从子女处得到的经济援助也可能与她特定样本子女的教育期望有关。此外，母亲对女儿教育预期也会影响她对女儿未来的规划。例如，在妇女集中从事农业劳作的地区，母亲对子女未来回馈模式的认知可能因此产生差

异。为检验是否存在这种理念，我们设置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3. 母亲对孩子未来的经济援助期望越大，她们对样本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

假设4. 认为子女接受教育后未来回馈具有性别差异的母亲，她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具有更大性别差异。

这项研究中一个关键在于调查母亲对孩子学习前途的评估是否也影响她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我们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5. 母亲的教育期望受样本子女在校参与度和他们先前的学业成绩影响。

最后，为了调查将母亲教育期望作为分析焦点的可行性，我们将检验2000年母亲对样本儿童的教育期望是否与2004年儿童入学状况相关。

考虑到经济制约和家庭资源（因有兄弟姐妹而）分散的影响，我们还分析了上述相关性是否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亲缘结构的影响下依然存在。

03 数据及分析方法

一、数据

《甘肃省儿童家庭调查报告》（以下简称GSCF）的数据来自中国内陆具有众多农村人口的甘肃省。GSCF在2000年抽取了2000名9至12岁的农村儿童作为样本，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每阶段均采用随机抽样。先选县，再选乡，再选村，最终选到儿童。在最后阶段，从选定的100个村庄的所有9-12岁儿童中，每村抽取20名，其中每家只抽选一个儿童。此外，还有可供追溯的二级样本，包括儿童的母亲和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村领导。2004年又收集了后续跟踪的数据，提供了大量与儿童在家、校、社区可接触到的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纵向数据调查样本儿童母亲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样本儿童4年后实际上的学业成绩。我们使用首批数据分析教育期望，并使用首批和次批数据分析入学情况。在剔除所有缺失数据的情况后，我们最终使用了1687例进行分析。

二、分析指标

家庭调查问卷中，除了家庭资产一项通常由父亲回答，我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从母亲那里收集的数据上。每位母亲都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内容有关她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对性别和教育的态度、以及她对所有孩子未来回馈的期望。调查问卷还包括每位母亲对抽样儿童的幸福感和学校表现的评价。以上所有指标都来自首批的调查。第二批家庭调查问卷是对儿童目前受教育状况的衡量。表1展示了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所采用的指标。

表1 研究指标（变量）的定义

指标（变量）名	定义
母亲的教育期望	“您认为自己子女能够达到的最高学历？”
性别平等观念	由四个问题确定： “女孩只要努力，可以和男孩做得一样好” “女儿与儿子应该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 “女性能够取得与男性同等的成就” “父母应该鼓励女孩和男孩一样拥有主见”
养老保障	“父母应依靠儿子保障自己晚年生活”
对女儿教育	“女儿总要出嫁，所以没必要让她们上学”
预期回馈	“您希望未来从子女身上获得多少经济扶持？”
子女在校参与度	“孩子喜欢上学”
子女在校状态	子女当前是否在校就读（2004）
子女学业水平	前一年的数学成绩（百分制）： A=90-100, B=80-89, C=70-79, D=60-69, F=59及以下
母亲受教育情况	母亲接受正式教育年数
父亲缺位情况	前一年父亲离家超过6个月
家庭资产	房产、家具、耐用品等财产总计价值
亲缘组成	家庭中子女总数 分别统计兄弟姐妹数量

母亲的教育期望——我们主要的衡量指标是母亲对样本子女的教育期望。每位母亲都回答了以下关于样本儿童的问题：“你认为你的孩子能达到的最高学历是什么？”总的来说，母亲们的期望非常高：27%的母亲希望样本孩子能从大学毕业。

母亲的观念——我们首先分析母亲对性别平等的普遍态度，包括母亲对女孩受教育权、女孩能力、社会中妇女平等以及家庭中儿童地位平等的态度。然后我们探究母亲对养老的态度。这个概念首先是通过询问母亲是否同意父母应养儿防老来定义的。接下来，询问更为极端的问题，即母亲是否认为，因为女儿要出嫁，所以送女儿上学是没用的。我们还研究了母亲们希望从孩子获得的经济援助量。最后，我们探究母亲是否会因劳动力市场中预期存在的性别歧视，而认为儿子和女儿受教育后将会有不同回馈。这一衡量指标取自母亲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即教育是否对男孩和女孩的未来收入产生不同影响。为了简化母亲态度的衡量指标，我们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合并了四项指标，建立了评估母亲性别平等观念的微型尺度模型。

孩子学业前景——我们通过两种方式衡量母亲对孩子学习前途的评估：母亲是否认为孩子喜欢上学，以及孩子上一学期数学成绩，后者以100分为单位进行衡量。在我们使用的双变量分析中，我们将儿童的学业水平分为五级，从A到F（没有E级）。鉴于学业等级在母亲的教育期望之前作答，母亲很可能会将分数作为判断子女学业前景的影响因素。

家庭背景指标——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准，我们考察了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是否家庭缺位、家庭资产和亲缘组成。母亲的教育程度是以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来衡量的。如果父亲在调查前一年离家至少6个月，则被视为家庭缺位。在甘肃农村，许多男性进城打临时工，是家庭获得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这种情况便由上述父亲缺位的指标替代。

在大多数人少有现金收入，且农业收入每年波动很大的情况下，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考察家庭资产比考察收入更为可靠。从家庭调查问卷中，我们得到了有关家庭财产和资产的详细信息。家庭资产的衡量指标包括住房、农业机械等生产设备、以及家庭耐用品。家庭资产按照这些的总价值计算。我们对其采用五分位去进行分析，以便在2004年的新数据中更明显地捕捉到该指标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变化，以及其对教育期望和儿童在校状态的影响。

家庭特征指标还包括亲缘组成。我们分别统计了兄弟姐妹的数量，以此考察亲缘组成与母亲教育期望及子女入学状况之间的关系。这些家庭背景的指标用来当作多变量分析中的控制变量。

子女在校状态——这是衡量儿童目前是否在校就读的指标。这些信息从2004年的第二批调查中获得，距第一批数据收集已经过去了4年。在大多数家庭中，问卷的这一部分由父亲完成。

三、分析方法

我们建立的的第一组模型在控制家庭背景这一变量下，理清了母亲的性别观念、对孩子学业前景评估与母亲对孩子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探究母亲的期望是否有助于预测孩子的学业坚持性。对于这两个模型，我们使用修正了聚类依赖项的广义估计方程（GEE）法来汇报稳健标准差。在这两项分析中，我们估计了混合样本的嵌套模型，然后分别模拟出男孩和女孩的完整模型。

四、结果分析

描述性结果——表2列出第一批(2000)数据中有关家庭背景特征和子女学业水平的描述性数据表格。样本儿童的平均年龄约为11岁，52%为男孩。平均而言，甘肃农村母亲接受的正规教育非常有限，只有4年左右。此外，男孩的母亲平均受教育程度比女孩的母亲略高。母亲受教育程度与母亲对孩子教育期望高度相关：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往往对孩子有更高的期望(计算得出，未显示)。例如，认为孩子完成小学学业即可的母亲自身平均只接受过约两年的教育；而期望孩子上大学的母亲中，有71%至少为初中毕业。

表2 分性别进行的家庭背景特征与子女学业水平描述统计

	男孩		女孩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子女个人特征:				
性别 (%)	52.40		47.59	
年龄	11.03	1.10	11.04	1.09
家庭社会经济状况:				
母亲受教育年数**	4.30		3.97	
父亲缺位情况 (%)	8.82		7.47	
家庭资产 (元)	15,156	17,105	14,184	16,623
亲缘组成结构:				
子女总数	2.22	.67	2.44	.76
长兄数***	.22	.42	.34	.53
长姐数***	.54	.76	.31	.59
幼弟数***	.23	.43	.51	.53
幼妹数***	.23	.44	.29	.54
子女学业水平: (以数学成绩参考)				
样本均分	74.19	14.47	74.39	14.18
均分达A级 (%)	10.75		11.44	
均分达B级 (%)	19.57		16.92	

均分达C级 (%)	28.17		29.10	
均分达D级 (%)	23.53		26.49	
均分F级 (%)	17.99		16.04	
子女在校状态 (2004) :				
目前在校就读 (%) **	88.86		84.49	
样本容量N	884		803	

****由均值或比例计算，在显著性 $p < 0.05$ 的T检验下具有性别差异。**

*****由均值或比例计算，在显著性 $p < 0.001$ 的T检验下具有性别差异。**

家庭资产和父亲是否缺位方面，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大多数父亲的缺位都是因为外出打工。而男孩和女孩的亲缘组成结构有显著差异。平均而言，男孩的兄弟姐妹明显少于女孩；男孩比女孩更可能有姐姐，而女孩更可能有弟弟。这表明，如果父母最初生下女孩，那么他们往往会生更多的孩子，以保证至少有一个儿子。这种差异反映了甘肃农村生育中仍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现象。Hannum和Kong (2002,19)指出，甘肃省1997年出生的男女性别比为124.17: 100，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110.38: 100大幅增加。

女孩和男孩取得了相同的学习成绩。如果母亲的教育期望是基于对子女学习前景的预估，她们应刻对女孩和男孩持相似的教育期望。

2000年收集第一批数据时，大多数儿童都处于小学适龄，并几乎都在就读。四年后(第二批数据)，有13%的孩子辍学了，这也是他们中大多数人达到上初中年龄的时候。11%的男孩和15%的女孩不再上学，儿童在继续深造方面的性别差异开始变得显著。换言之，女孩失学的风险比男孩高39%。这一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随着小学教育普及，只有进入更高的教育阶段，教育成本上升时，性别差异才会逐渐成为明显问题。

表3列出了母亲对子女教育期望、母亲的性别观念、母亲对子女学习前景评估的数据。母亲的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大约25%的女孩母亲希望女儿接受大学教育，而大约30%的男孩母亲有类似的期望。大约37%的女儿母亲和46%的男孩母亲希望高中毕业。如果女儿初中毕业，31%的女孩母亲会感到满意，而只有21%的男孩母亲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表3 母亲对子女性别态度的描述性统计 (均以百分比%记录)

	男孩	女孩
对子女教育期望：***		
小学毕业	3.3	6.0
初中毕业	20.8	31.0
高中毕业	46.3	37.5
大学及以上	29.6	25.5
性别平等观念：		
女孩在校表现可以和男孩一样好：		
反对	1.2	.5
中立	8.9	8.7
同意	89.8	90.8
女性能够取得同男性一样的成就：		
反对	1.6	2.6
中立	9.2	8.5
同意	89.3	88.9
女孩应该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		
反对	2.0	1.5
中立	7.9	7.9
同意	90.1	90.7

父母应鼓励女孩拥有主见：		
反对	2.3	2.2
中立	14.5	14.3
同意	83.3	83.4
养老保障：		
父母应依赖儿子保障自身晚年生活：		
反对	23.1	24.2
中立	19.2	21.4
同意	57.7	54.4
女儿总会出嫁，所以不用教育她们：		
反对	69.8	66.6
中立	14.0	15.1
同意	16.2	18.3
预期回报（希望从子女获得的经济扶助）：		
很多	19.5	17.2
一些	66.3	65.9
很少	14.3	16.9
教育回馈 （是否同意“教育对男孩未来收入的影响大于女孩”，以【同意】所占百分比计）**	48.8	44.0
子女在校参与度（是否喜欢上学）：		
从不	4.2	3.4

有时	48.2	45.7
总是	47.6	50.9
样本容量N	884	803

****在 $p < 0.05$ 的卡方检验下与性别相关。**

*****在 $p < 0.001$ 的卡方检验下与性别相关。**

为了考察与母亲教育期望中性别差异有关的因素，我们首先考察了母亲对性别平等的总体态度。大约90%的母亲同意关于妇女的社会能力、女孩受教育权利和女孩学习能力方面的平等观念。稍微少一些的母亲(83%)同意在家里让儿子和女儿具有平等的社会性(“父母应鼓励女孩像男孩一样有自己的观点”)。这些结果表明，至少在原则上，甘肃农村妇女拥有平等主义的理念。然而，仍然有大约10%的母亲未主动表示（指反对或中立）女孩应该享有与男孩相同的教育机会。

当问及对子女未来赡养的期望时，约58%的男孩母亲和54%的女孩母亲认同父母应该依靠儿子养老；约18%的女孩母亲和16%的男孩母亲同意最极端的说法，即教育女儿无用，因为她们总会出嫁。因此，尽管母亲们普遍表示她们对性别有着极其平等的信念，但实际上许多母亲仍希望在晚年依靠儿子获得经济支持。

至于孩子未来的回馈，大约20%的男孩母亲和17%的女孩母亲希望孩子未来提供较多的经济扶助。大约49%的男孩母亲和44%的女孩母亲认同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男孩会比女孩获得更好的回馈（收入）。在母亲对子女在校参与度的评价方面没有性别差异。约一半的母亲表示孩子总是喜欢上学。

上述这些态度显然与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相联系。期望中的性别差异在那些不同意或不积极赞同平等主义思想的母亲中最为明显。图1展示了根据母亲对“同等机会下，女性能够取得同男性一样的成就”这一说法的不同态度，母亲对样本子女取得大学学历的期望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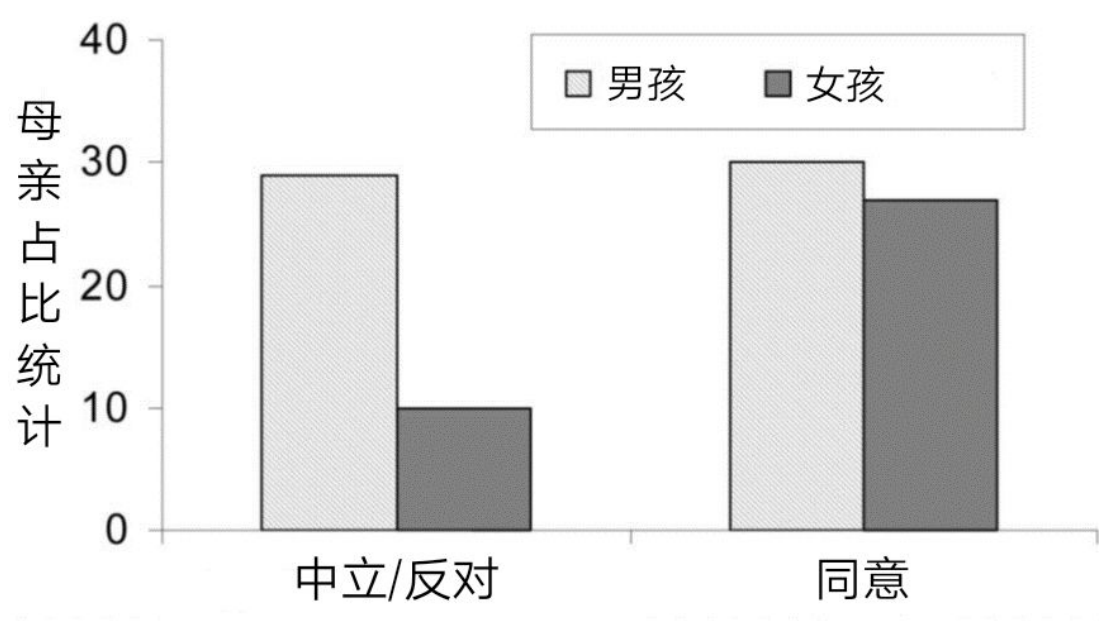


图1 按母亲对女性潜能态度分列，有大学教育期望的母亲百分比
男孩母亲和女孩母亲的比例差异在0.05的t检验下具有显著性

在同意这一说法的母亲中，男孩和女孩的母亲在教育期望方面几乎没有差别。在中立和不赞同的母亲中，女孩母亲和男孩母亲之间的差异高达19%。在这个群体中，29%的男孩母亲希望儿子上大学，而只有10%的女孩母亲有同样的期望。通过比较希望女儿上大学的母亲们对此种说法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显著的差异。与中立或反对这一说法的母亲相比，赞同该理念的母亲中，希望女儿上大学的人数是前者的2.2倍。结果是一致的，当我们联系母亲的大学愿望样本儿童与母亲的意见，在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我们的计算，没有显示)。这与我们将母亲对儿童上大学的期望与母亲对教育中性别平等的看法相关联时的结果是相吻合的。

以上结果表明，女孩将受益于这些持性别平等态度的母亲，因为这种态度意味着为母亲对女孩和男孩的教育期望相似。这种模式与我们的假设1一致，即母亲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总体上与子女的教育期望有关。

接下来，我们检验母亲对依赖儿子养老的传统观念的看法是否与孩子的教育期望有关。图2展示了根据母亲对“教育女儿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们将出嫁”这一说法的不同态度，母亲对样本子女取得大学学历的期望。虽然大多数母亲不同意这种极端的说法，但仍有约五分之一的母亲同意。与同意该理念的母亲相比，不同意的母亲更可能希望自己的女儿上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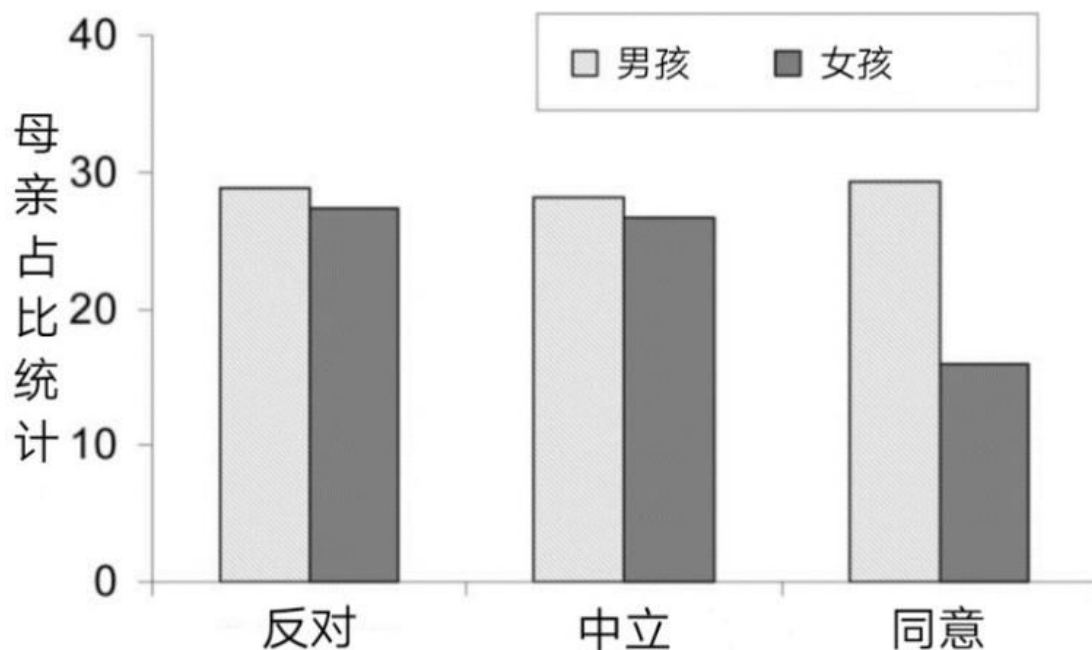


图2 根据对“教育女儿是否浪费”态度分列的，
希望孩子上大学的母亲的百分比
男孩母亲和女孩母亲之间的态度在0.05的卡方检验中有显著差异；
持同意态度比例在0.05水平的检验中有显著差异。

图3考察了母亲对孩子上大学的期望和她对孩子未来经济回报期望之间的关系。希望将来得到更多经济支持的母亲对孩子有着上大学的更高期望。在表示不太需要孩子未来赡养的男孩母亲中，28%有让孩子上大学的期望；相比之下，在需要孩子提供更多扶助的男孩母亲中，这个比例达到34%。而上述差异在女孩的母亲中高达15%。图3显示，母亲的教育期望与其希望在年老时得到的经济援助量直接相关；此外，对子女未来经济援助的期望在女孩教育上的影响大于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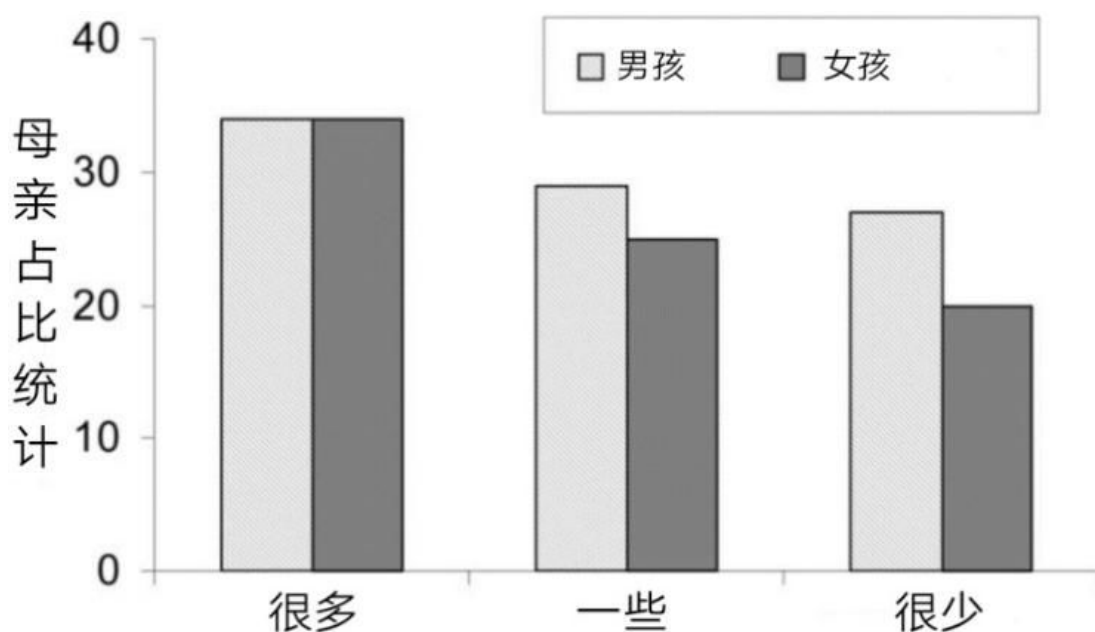


图3 根据年老时希望获得的经济援助量分列的，
期望子女上大学的母亲所占的百分比
男孩母亲和女孩母亲之间的差异在0.05水平的卡方检验有显著差异。

图4按照孩子的性别，将母亲的教育期望与孩子的数学成绩联系起来比较。上大学的期望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然而，在所有的

成绩等级中，都存在着偏好于男孩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在孩子数学成绩达B级的母亲中最为明显(在这个群体中，男孩母亲比女孩母亲更有可能对孩子抱有上大学的期望)：当男孩的成绩从C上升到B，母亲的期望从26%上升到37%；然而这两组的女孩之间只有5%的差异。要让女孩的母亲达到与B级男孩母亲相近的教育期望，女孩必须排在最优异的一组。中间三个成绩组涵盖了样本中81%的儿童，其中每组母亲的教育期望都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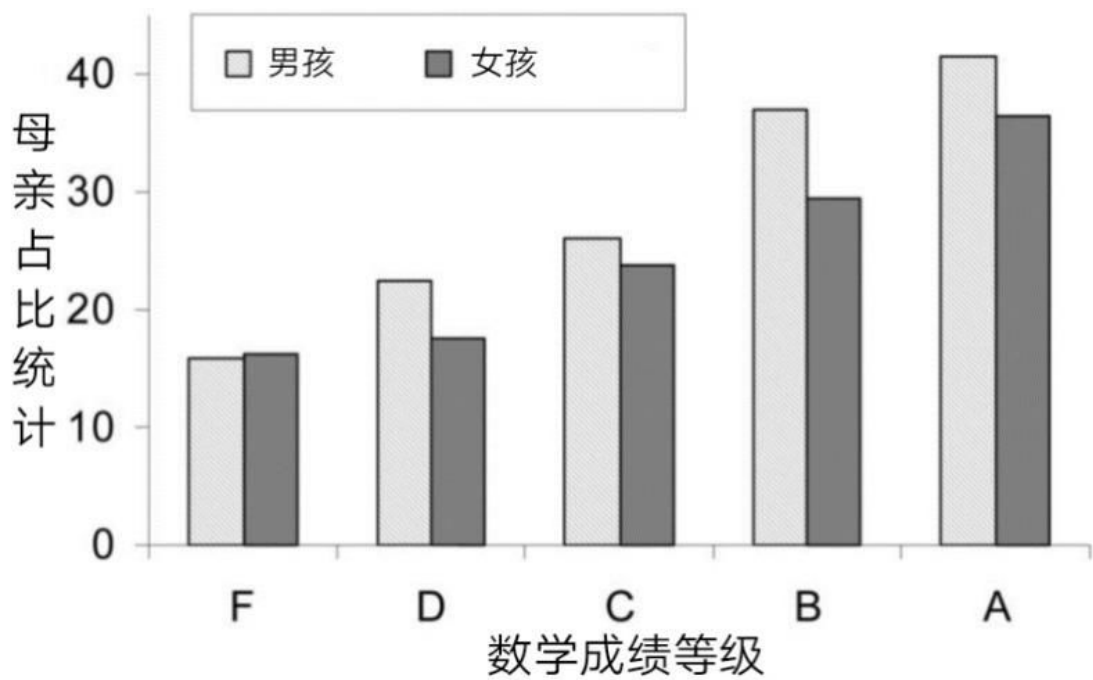


图4 按子女成绩分列的，持上大学期望的母亲百分比
男孩母亲和女孩母亲间差异经卡方检验有显著差异。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对子女社会潜力和教育女儿是否无用的态度、以及母亲对子女未来回馈的期望，都与母亲对样本儿童的教育期望密切相关。那些最缺乏平等观念的母亲在教育方面表现出最大的性别差距。对于孩子的学业水平，母亲教育期望的高低与之合理相关；但在同等的成绩水平上，男孩母亲比女孩母亲体现出更高的期望。

多变量分析——表4展示了我们对母亲教育期望采用GEE拟合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在这部份的分析中，我们将母亲的期望简化为两类：完成初中以下学业，完成高中或以上学业。所有的模型都以孩子年龄为控制变量。

表4 母亲对子女教育期望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优势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男孩	女孩
子女个人特征:						
女性占比	.54 ***	.53 ***	.49 ***	.50 ***		
	(.11)	(.11)	(.11)	(.13)		
年龄	1.05	1.08	1.09	1.07	1.15	1.03
	(.05)	(.05)	(.06)	(.06)	(.08)	(.07)
母亲性别观念:						
性别平等因素		1.22 ***	1.24 ***	1.25 ***	1.14	1.33 ***
		(.06)	(.06)	(.06)	(.08)	(.08)
养儿防老:						
反对 (参考值)	
中立		1.53	1.58	1.5	1.53	1.62
		(.24)	(.24)	(.24)	(.30)	(.29)
同意		.75	.76	.79	.6	.90
		(.18)	(.18)	(.18)	(.27)	(.18)
教育女儿无用:						
反对 (参考值)	
中立		.79	.83	.92	.65	1.1
		(.27)	(.27)	(.27)	(.29)	(.33)

同意		.76	.77	.82	.98	.73
		(.19)	(.19)	(.19)	(.30)	(.23)
子女经济回馈:						
很少 (参考值)	
一些		1.62 **	1.65 **	1.63 **	1.77 **	1.60 **
		(.16)	(.17)	(.17)	(.26)	(.23)
很多		2.15 ***	2.11 ***	2.09 ***	1.87 **	2.35 **
		(.22)	(.22)	(.23)	(.31)	(.30)
教育对子女的回馈		1.22	1.20	1.14	.99	1.28
		(.12)	(.12)	(.12)	(.18)	(.16)
子女学业前景:						
子女在校参与度			1.44 **	1.51 **	1.95 ***	1.20
			(.12)	(.13)	(.17)	(.17)
数学成绩			1.024 ***	1.022 ***	1.029 ***	1.025 ***
			(.005)	(.005)	(.007)	(.00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母亲受教育程度				1.04 **	1.07 **	1.02
				(.02)	(.03)	(.03)

父亲缺位				1.46 (.21)	1.83 (.33)	1.14 (.30)
家庭资产:						
第一五分位 (参考值)			
第二五分位				1.42 (.20)	1.45 (.25)	1.44 (.27)
第三五分位				1.30 (.21)	1.29 (.29)	1.36 (.26)
第四五分位				1.70 ** (.20)	1.87 ** (.29)	1.60 (.26)
第五五分位				1.79 ** (.21)	1.88 ** (.27)	1.67 (.28)
亲缘构成:						
长兄				.93 (.14)	.86 (.22)	1.02 (.17)
长姐				.93 (.09)	1.06 (.12)	.75 (.16)
幼弟				.96 (.15)	.72 (.21)	1.20 (.18)
幼妹				.80 (.12)	.73 (.18)	.80 (.15)
最大缩放 R^2	.03	.08	.13	.14	.17	.11
N	1,658	1,658	1,658	1,658	868	790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 $p < .05$

*** $p < .001$

模型1只包含儿童性别一个指标, 可得性别对母亲的教育期望有显著影响。男孩母亲比女孩母亲有更高教育期望的可能性高1.8倍(1: 0.54)。

在模型2中, 我们加入了母亲的性别观念、母亲对老年赡养的态度、以及母亲对子女未来回馈的预期量。结果得出, 母亲的性别态度与母亲的教育期望显著相关。在性别平等态度量表中, 每提高一个单位 (指观念更倾向性别平等), 拥有更高教育期望的几率就会增加22%。母亲的期望也与对子女未来经济帮助的期望量密切相关。那些希望从孩子那里得到大量扶助的母亲, 对孩子抱有更高期望的可能性, 是那些几乎不需要什么扶助的母亲的两倍。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1和假设3, 即母亲的性别平等态度和母亲对获得更多经济支持的希望与子女接受更高教育的期望有关。

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 母亲对于“是否应该依靠儿子养老”以及“女孩接受教育是否为浪费”的态度, 与母亲对样本儿童的期望没有显著相关性。我们还发现, 母亲对“未来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的反馈有性别差异”的认知与母亲对样本子女的教育期望没有显著关联。这些结果与我们先前的假设, 即母亲对养儿防老的传统 (假设2) 及母亲对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的预估 (假设4) 与子女的教育期望有关, 形成了明

显对比。

模型3加入了母亲对孩子在校参与度以及前一学期孩子数学成绩的评估。母亲对孩子是否喜欢上学的评分分为两类：总是喜爱学校生活、偶尔或从不喜爱学校生活。认为孩子总是乐于接受学校教育的母亲与认为孩子不享受学校教育的母亲相比，前者有更高期望的可能性是后者1.4倍。正如描述性分析结果中所见，孩子的学业成绩是预测母亲教育期望的一个强力因素（当然，这种因果关系可以是双向的）。当孩子的成绩提高20分，母亲们有更高期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50%。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假设5）相一致：母亲们通过参考孩子前一年的学业成绩，理性地建立对孩子的教育期望。然而，在子女在校参与度和成绩等同情况下，母亲的性别态度和母亲对子女未来回馈的期望，仍然与教育期望密切相关。

在全模型中，我们添加了家庭背景特征。添加家庭背景指标后，之前几个模型所体现的关联性并没有改变，因此母亲的观念和孩子的表现不单纯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投影。不过家庭背景自身也存在一些影响。与来自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母亲相比，来自家庭资产排名前五分之一家庭的母亲有着更高教育期望，这与许多过往研究的结果一致，即贫穷是制约农村儿童就读的主要因素之一。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她们更有可能对孩子也有更高的教育期望。

最后，我们分别为男孩和女孩运行全模型。在这两个模型中，不同的因素影响着母亲对男女孩子的期望。首先，母亲的观念对女儿很重要，但对儿子不重要。对于男孩，母亲的性别观念总体上与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无显著相关性。对于女孩来说，其他因素相同时，母亲的性别态度与她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密切相关。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性别态度会独立地影响女童接受教育”的文化影响说。

其次，母亲对孩子在校参与度的评价对男孩和女孩也有不同的影响。相信儿子乐于上学的男孩母亲，与那些不喜欢上学的男孩母亲相比，前者拥有更高教育期望的几率是后者的两倍。然而，对于女孩来说，并没有类似的相关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家庭资产在母亲对女儿的教育期望上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对于那些来自家庭资产排名前五分之一家庭的男孩来说，其他因素相同时，他们的母亲抱有较高期望的可能性明显高于来自最贫穷（处于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男孩。母亲所受教育程度在母亲对儿子的期望上有显著影响，但对女儿的期望没有显著影响，这与以前的许多研究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女儿的教育有更大的影响”这一结论不同。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我们再次进行了分析：首先加入家庭背景特征，然后添加母亲观念的指标。结果体现，当模型中没有母亲思想观念这一指标时，母亲所受教育程度与对女儿的教育期望密切相关；然而，当加入母亲观念时，这种关联性就消失了。这种差异表明，母亲所受教育对女儿教育期望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母亲的性别观念体现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不太可能遵从那些（导致低教育期望的）传统性别观念。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教育对女性具有强大的赋权效应（Shu 2004）。

在男女孩子的模型中，其他因素相同时，是否有兄弟姐妹对母亲的教育期望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全模型并不能充分说明母亲在教育期望方面的性别差异：女孩母亲的期望仍然低于男孩母亲。我们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母亲对孩子教育期望的其他影响因素。

我们在分析的最终环节里，使用了GSCF的纵向数据来验证我们的假设，即母亲的教育期望会影响孩子选择辍学或辍学。2000年，收集第一批数据时，98%的孩子都在校就读。我们用“学业持久性”来指代从00至04年仍在上学的孩子。尽管在04年第二批数据收集时，一小部分孩子可能已经初中毕业，但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母亲的性别观念和教育期望对其子女继续就读（包括高中）的影响，因此这一部分子女也将纳入分析范围。在这一环节的分析中，我们使用的样本仅为00年在校就读的学生。剔除缺失数据后，可用案例有1574个。

本环节采用的结果变量是2004年儿童入学情况。第一批数据中，我们将母亲的教育期望设为主要预测因素，此外还包括了孩子学业成绩和家庭背景特征。所有模型中，设儿童年龄为控制变量。同样，我们对整个样本运行嵌套模型，然后分别为男女孩运行全模型。由于只有5%的母亲持小学毕业的期望，我们把初中及以下归为一个类别，并以此作为参考项。另外两个类别分别是高中期望和大学期望。

表5列出了对儿童入学状况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5 儿童就读情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优势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男孩	女孩
子女个人特征：						
女性占比	.68 ** (.16)	.78 ** (.17)	.70 ** (.17)	.71 (.19)		
年龄	.41 *** (.09)	.38 *** (.09)	.39 *** (.09)	.38 *** (.10)	.43 *** (.14)	.34 *** (.14)
母亲教育意愿：						
初中及以下为参考值						
高中		1.92 *** (.19)	2.17 *** (.20)	2.06 *** (.20)	2.24 *** (.31)	2.13 *** (.27)
大学		2.60 *** (.23)	2.29 *** (.23)	2.14 *** (.24)	2.48 *** (.35)	2.13 *** (.33)
孩子学业水平：						
数学成绩			1.023 *** (.006)	1.023 *** (.007)	1.010 (.009)	1.028 *** (.01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母亲教育水平				1.07 ** (.03)	1.00 (.04)	1.15 *** (.04)
父亲缺位				1.95 (.39)	1.06 (.52)	4.10 ** (.65)
家庭资产：						
第一五分位点为参考值						
第二五分位点				1.06 (.25)	1.6 (.35)	.70 (.37)
第三五分位点				1.29 (.26)	2.14 ** (.38)	.77 (.39)
第四五分位点				1.72 (.28)	2.93 *** (.41)	.9 (.40)
第五五分位点				1.92 ** (.28)	4.70 *** (.41)	.77 (.40)

				(.31)	(.49)	(.44)
亲缘构成:						
长兄				1.16	1.26	1.18
				(.21)	(.34)	(.28)
长姐				1.43 **	1.55	1.3
				(.15)	(.23)	(.22)
幼弟				1.00	1.32	1.12
				(.20)	(.32)	(.28)
幼妹				1.20	1.23	1.30
				(.19)	(.33)	(.24)
最大缩放R ²	.15	.19	.20	.23	.20	.28
N	1,574	1,574	1,574	1,574	813	76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 p<.05

*** p<.001

第一个模型只包括了子女的性别。性别对孩子的学业持久性有显著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年龄以外的因素，男孩继续就读的可能性大约是女孩的1.5倍(1: 0.68)。

模型2展示了添加母亲期望后的结果。母亲的教育期望对孩子的学业持久性有显著影响。如果母亲拥有高中期望或大学期望，她的孩子继续就读的几率分别是母亲只有初中及以下期望的1.9倍和2.6倍。在这里，当考虑到母亲期望时，孩子的性别不再对学业持久性有显著影响。

在模型3中，我们又加入了孩子的在校成绩。母亲期望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只是程度略低。结果体现，孩子先前的数学成绩也是4年后孩子是否继续就读的有力预测因素。数学成绩高出20分，继续就读的几率便高出46%。可以得出，孩子先前的成绩不仅影响母亲的期望，还可以预示孩子的实际学业持久性。

在全模型中，我们添加了家庭背景特征，其中包括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缺位情况、家庭资产和亲缘结构。母亲教育期望仍对结果存在强烈影响。结果体现，母亲受教育程度、身处资产排前五分之一的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学业持久性有显著影响，家里有姐姐也会增加孩子继续上学的几率。

最后，我们分别为男女孩运行全模型。母亲的教育期望对男女孩的影响是相似的，然而，影响男女孩学业持久性的其他因素上有明显的差异。男孩先前的学业成绩对未来达到的学历等级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对于男孩来说，家庭经济状况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他因素相同，与来自最贫穷家庭的男孩相比，样本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男孩继续就读的可能性是前者的4.7倍。我们推测，只要家庭能够负担，就不会顾及儿子先前的学业成绩，而让他们继续深造。长姐的存在对男生学业持久性的影响略有显著性(p= .055)：拥有长姐会使样本男孩上学的几率增加55%。这可能间接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为了有儿子而一直生孩子的家庭更有可能让男孩继续就读。

然而，女孩的情况恰恰相反。以家庭资产衡量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女孩的学业持久性没有影响。这一结果与以前的许多研究结论相违背，后者认为贫穷对农村地区女童的就读有负面影响。为了检验这一结果，我们只使用家庭资产的指标，重新分别运行男女孩的模型。而这次的结果是一样的：家庭财富本身并不能直接预测女孩学业持久性。然而，父亲缺位与女孩继续就读几率的增加显著有关，而这一变量对男孩的学业持久性没有显著影响。在我们的研究背景下，这些父亲中的许多都是农民工。也就是说，额外的现金来源可能对支付学费至关重要，父亲们则可能会带着这种需要而外出打工。

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女孩继续就读的另一个重要预测因素，不过它对男孩学业持久性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一联系表明，母亲自己的教育程度和对女儿的期望，对女儿的实际就读情况有很大的影响。除了母亲的影响，成绩对女孩是否继续上学也很重要。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女孩需要更早地表现出（优异的）学业前景，才能继续深造。

影响继续深造的另一个因素是孩子的年龄。年龄较大的孩子坚持就读的可能性较小。这反映出，在中国农村地区，小学入学率几乎普及，而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经济状况和性别在孩子是否继续就读方面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04 结论

一、总结

本文使用中国西北农村地区一项纵向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母亲在子女教育期望中重男轻女现象的普遍性，以及母亲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持久性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母亲的性别态度与对女儿的教育期望密切相关。在持有传统性别价值观的母亲中，母亲教育期望中的性别偏见更为明显。此外，与女孩母亲相比，男孩母亲在确定自己的教育期望时，更多受子女在校参与度影响。我们发现，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影响了孩子后续的学业持久性。此外，母亲期望的差异可以说明后续就读时性别差异的问题。对于男孩来说，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他能否继续就读最为重要；相反，对女孩来说成绩很重要。女孩既受益于母亲更高的教育期望，也受益于母亲自身受教育程度。

二、讨论与结论

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儿童就学情况的研究侧重于父母决策的结果：包括儿童入学情况和成绩。有关女孩和男孩父母的教育决策研究强调了家庭经济策略的合理性，即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儿童教育“投资”的回报，并强调了在父系家庭结构社会中女孩所面临的不利处境。本文以甘肃农村为个案，考察了母亲教育期望的形成以及母亲的教育期望对几年后子女实际学业持久性的影响。我们主要的研究表明，母亲的性别平等观与她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密切相关。此外，其他家庭特征等同下，母亲的期望对孩子的学业持久性有显著影响。

这些结论强调了传统文化在制约家庭理性策略方面的作用。占主导地位的父亲家庭结构作为文化规范的社会基础，将儿子与家庭紧密相连；因此在经济受制时，家庭将教育资源投资于女儿显得不甚合理。与这一点相呼应，我们的研究表明，教育期望中的性别偏见在持传统性别价值观的母亲中最为明显。尽管大多数母亲认同教育对女儿未来的重要性，但大多数母亲也会顾虑自己未来老年生活的保障。

母亲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形成也考虑到了子女在校参与度和子女学业水平。然而，孩子的天资对母亲期望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母亲对她们认为热爱学习的男孩抱有更高的期望，但女孩一侧并无此种关联。

涉及到实际的学业持久性时，虽然男孩和女孩都受益于母亲的高教育期望，但男孩则极大地受益于较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对男孩在学校的学业水平更加宽容，不管成绩如何，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家庭就会让男孩继续深造。我们惊讶地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直接影响女孩学业的持久性。然而，影响女孩深造的可能因素是母亲自身学历和母亲对女儿的教育期望。

我们发现，女孩更高的学业成绩对于她们的学业持久性有着很重要的预测作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Brown and Park 2002; Zheng et al. 2002)。然而，学者们还未考察母亲的期望和性别平等观念是如何影响学业持久性的。未来的研究人员应继续探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母亲的态度、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孩子学业持久性之间的关系是否与此相似。这些结果表明，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可能还包括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研究，以突破那些仅仅以贫困来解释教育结果中性别差异的论点。



排版 | 舟舟

审核 | 橄榄子

